

“乌克兰文学”背后的国际政治学： 来自西方斯拉夫学的论述

林精华

【内容提要】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帝俄体制内外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虽然在具体文学现象认知上有差别，但都把通过殖民扩张而不断扩大的俄罗斯帝国之文学，视为统一的“俄罗斯文学”。在这种文学版图中，是不存在包括“乌克兰文学”在内的非俄罗斯文学的。这种相当程度上背离历史的话语战略，在苏联时期得到延续、强化。流亡在欧美的乌克兰裔学者不断成立学术组织，通过大量史料发掘“乌克兰历史”“乌克兰文学”，从而解构苏俄建构的“俄罗斯文学史”。把乌克兰文学作为专门的文学现象从俄罗斯文学中分解出来，不仅有助于还原乌克兰作为主体民族和国家的地位，而且颠覆了长达三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所建立的统一的“俄罗斯文学”概念，这连同乌克兰侨民所保留和彰显的乌克兰身份一道，共同推动了乌克兰作为主体民族之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这种学术工作及其成果成为西方斯拉夫学的一部分，为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建构主体民族和国家提供了思想资源，塑造了乌克兰人异于俄罗斯人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 “乌克兰文学” 俄罗斯文学 乌克兰侨民 西方斯拉夫学 乌克兰民族认同

【作者简介】 林精华，安徽大学至诚讲席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14ZDB089）阶段性成果。

1987 年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卢丘克 (Lubomyr Y. Luciuk) 和阿尔伯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科丹 (Bohdan S. Kordan) 选编《英美论乌克兰问题: 1938 ~ 1951 年文献汇编》, 收录出自英美驻苏或东欧国家的大使、外交官、智库专家、国防部官员等之手的 54 份文件, 它们基本上将乌克兰视为苏联境内和俄罗斯一样的主体民族。考虑到 1991 年乌克兰独立、2014 年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及引发乌克兰危机、2015 年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① (其母为乌克兰人, 其本人在乌克兰长大) 获诺贝尔文学奖等引发全球关注乌克兰问题的效应, 尤其是 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所产生的震撼力, 我们不得不重视西方对乌克兰认知的前瞻性、深刻性, 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乌克兰人不愿成为“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 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自 1654 年《佩列亚斯拉夫协定》签署以来, 在帝俄/苏联构筑的知识谱系和文学批评框架内, 乌克兰人是否从审美上创造出不同于“俄罗斯文学”的“乌克兰文学”。苏联解体自动衍生出如何处理遍布原苏联空间的俄语、俄罗斯文学、俄罗斯东正教会、帝俄/苏联各种纪念碑等在内的俄罗斯文化遗产的难题。这些问题在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诸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而他们处理这些遗产的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牵动着当代俄罗斯敏感神经。

在统一的“俄罗斯文学”中发现“乌克兰文学”

原苏联空间国家在获得独立的进程中, 普遍要建立包括其本国文学史在内的知识体系, 乌克兰也进入了这一进程。对这一正常态势, 俄国当局和精英极为警觉, 因为连学界也没有从帝俄崩溃和苏联解体中认识到后殖民批评反思之重要性, 仍囿于帝俄和苏俄的惯例, 致力于维持并深化固有的阐释传统。2004 年俄罗斯科学院果戈理学术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大学教授沃罗帕耶夫 (Владимир Воропаев) 在“果戈理与东正教”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报告《果戈理: 精神传记》中声称, “没有哪位俄罗斯作家像果戈理那样强烈揭示俄罗斯灵魂的诸多痛苦”, “果戈理认为俄国精神复活的唯一条件是复兴俄罗斯精神的宗教仪式”, “在《与友人书简》中, 果戈理是以国家人的角色言说的, 渴求最好的国家制度”; 果戈

^① 多译为“阿列克谢耶维奇”, 考虑到其俄文姓氏为“Алексиевич”, 译为“阿列克西耶维奇”更为准确。

理为俄国辩护，不是为确立俄国的世界使命，重要的是国家的精神结构特征，“果戈理看俄国，首先是东方正教观点”^①。这种观点并未把《与友人书简》等作品置于历史情境中，看不到果戈理深切体会到帝俄借助现代欧洲文明所建立的制度，借助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波兰等族群造成伤害，照旧按帝俄/苏联知识框架演绎果戈理。但此举远非学者的个人行为。2001年4月初，莫斯科城市文化委员会和“果戈理之家”等联合举行首届“果戈理阅读报告会”，从共同的俄罗斯东正教角度讨论果戈理的帝俄认同；俄国许多重要人文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发表学术报告，发掘果戈理作品如何认同俄罗斯的微言大义。自此，俄罗斯每年都在三月底或四月初举行“果戈理阅读报告会”，主题涉及果戈理与俄罗斯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多个方面，且无不将果戈理“俄罗斯化”。更有甚者，索科洛夫主编的《果戈理百科辞书》收录近170个条目，但不曾涉及果戈理和乌克兰的关系^②。在自认为具有强大话语建构能力的帝俄/苏联及其所安排的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果戈理被塑造为“俄罗斯经典作家”，哪怕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排斥帝俄，却重新厚葬果戈理^③，其作品也被大量引入教材。舍甫琴科（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这位有着更明显、更强烈的乌克兰诉求的乌克兰裔作家（用乌克兰语写诗歌），也被俄罗斯化为经典。1918年彼得格勒就竖起舍甫琴科塑像，当代俄罗斯同样把这位乌克兰作家当作俄罗斯作家对待。同样，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州的著名文学史家温格罗夫（Семён Венгеров），入眠于彼得堡最著名的“文学栈道”公墓，其族裔身份被掩饰。苏联时期，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文学都没有获得主体地位，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教育部为中学十年级编订的《乌克兰文学文选》虽用乌克兰语书写，但内容和思想却是“苏联”的。苏联官方认可的乌克兰作家，包括季奇纳（Павло Тичина）和里利斯基（Максим Рильський）等，实际上也鲜有乌克兰意识^④。

这些做法自然产生了外溢效应。时任乌克兰国立塞瓦斯托波尔科学院第一副

① Сб. Н. Гоголь 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М.: ЗАО “Издо. Дом К единству”, 2004, С. 48 – 49.

② Соколов Б. В. Гогол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М.: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Око, 2007.

③ 1852年3月7日在莫斯科大学圣女殉道者塔季扬娜大教堂为果戈理举行葬仪，将其葬于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墓地。1929年这个墓地被关闭，1931年果戈理墓被迁移到安葬最重要文化名人的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④ Бондареко А. И., Кашуба М. Ф., С. М. Шаховский (сост.),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ро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для х класу середньої школи. Київ: Радянська школа, 1957.

院长和基辅国立塔夫里大学副校长卡扎林（Владимир Казарин），在 2004 年第四届“果戈理阅读报告会”上发表报告《乌克兰和俄国：不可分离的精神同源》，把乌克兰文化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认为忠诚于乌克兰的彼得一世宠臣普罗科波维奇（Феофан Прокопович），把对乌克兰认同转化为效力俄国。发表如此俄罗斯化观点的卡扎林曾任克里米亚共和国总理（2001～2004）、乌克兰第四和五届最高拉达（议会）代表，还是克里米亚俄罗斯文化协会主席、俄罗斯作协会员。2008 年乌克兰教育科学部与果戈理家乡所在地大学即波尔塔瓦高等师范大学在纪念果戈理诞辰 200 周年之际，刊行七卷本乌克兰文《果戈理全集》并举行“波尔塔瓦果戈理阅读报告会”，以求还原果戈理的乌克兰身份，卡扎林却发表演讲《乌克兰与俄国——果戈理与普希金》，声称果戈理的创作生动呈现了乌克兰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有机统一性，“俄国人把乌克兰文化视为俄罗斯文化的有机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对乌克兰及其居民来说并不是侮辱性的”，俄罗斯文化是乌克兰兄弟极为宝贵的礼物，“对俄罗斯人来说，乌克兰人是在帝国框架下存在的，对某些东西需要习惯并墨守成规”^①。

2015 年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任乌克兰总统在 Facebook 上发文祝贺称，这位出生于乌克兰西部城市、其母亲是乌克兰人的女作家获奖是乌克兰的骄傲，“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讲什么语言，我们一直是乌克兰人”。俄联邦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在得知她获奖翌日刊文称，“这位著有艺术文献叙事类作品的俄罗斯文化人，信心满满地进入欧洲知识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②；《莫斯科时报》随后刊文盛赞，“她成了 28 年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③。但与官方态度相反，俄罗斯文学家对她多持严厉批评态度；《文学报》就其获奖而特别邀请作家和批评家进行讨论，多持否定态度。该事件及其后续效应引发思考的是，这位俄语作家究竟是代表俄罗斯文学还是体现“去俄罗斯文化”的白俄罗斯文学或乌克兰文学，从俄罗斯文学中

^① В. П. Казарин, Украина и Россия—Гоголь и Пушкин//М. Степаненко и др. (ред.): М. Гоголь и свитова література: Гоголієвський читання в Полтаві. Полтава: ТОВ “АСМІ”, 2009, С. 4–5.

^② 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 – о том, заслужила ли 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 Нобелевку。https://www.rg.ru/2015/10/12/premiya.html, 访问时间: 2023 年 1 月 3 日。

^③ Unfair Observer, “Weekly Wrap: Nobel Prizes and Shopping Bears”, *The Moscow Times*, 16 Oct. 2015.

分离出来的白俄罗斯文学或乌克兰文学等，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文学远非文坛事务，对果戈理的认知关乎乌克兰是斯拉夫兄弟还是主权国家的身份以及乌俄关系、乌欧关系之类的重大敏感话题。其实，苏俄政权建立以降西方就关注苏俄内部构成问题，冷战以来向苏东侨民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开放的斯拉夫学，更关注帝俄/苏联所建构的统一的“俄罗斯文学”“斯拉夫世界”“俄罗斯世界”这类概念的可疑性，并且这类研究对西方产生了深刻影响。布热津斯基在苏联解体初期出版的《大失控：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动荡》中声言，“没有乌克兰，俄国就不再是欧亚帝国”^①。不想一语成谶：近三十年后，俄乌军事冲突真的发生了。

在后苏联空间分离进程中危机日益深重的“俄罗斯文学”的确与乌克兰问题有关。众所周知，《佩列亚斯拉夫协定》签署后，沙俄加紧征服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乌克兰东部地区，不足半个世纪，乌克兰就完全失去了主体民族地位，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到18世纪末，帝俄和普鲁士、奥匈帝国瓜分波兰，获得乌克兰西部很多领土；维也纳体系又为这种殖民遗产提供了合法性，促使帝俄通过书报刊审查制度，禁止讨论乌克兰问题，用“小俄罗斯”替代“乌克兰”。如此政策，使帝俄比较文学奠基人弗谢洛夫斯基著述《小俄罗斯民间故事》，把乌克兰民间文学视为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②。苏联更甚于帝俄，把乌克兰视为斯拉夫世界乃至俄罗斯的一部分，乌克兰语写作遭到被俄语垄断的苏联学术界有意识的限制，史学家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Михайло Грушевський）就因坚持用乌克兰语撰写关于乌克兰作为主体民族的《乌克兰-罗斯史》而被捕。在这样的险恶局势下，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德罗布连科娃汇编的有关苏联文学的研究书目，“因为技术原因，没能收录外国出版的、用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书写的文献”^③。

但是，苏联不断促使大批乌克兰人流寓到欧美，反而促成乌克兰侨民精英在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New York: Scribner, 1993, p. 51.

^② Вселовский А. Мало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предания и рассказы.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И Л.: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С. 167 - 184.

^③ Дробленкова Н. Ф. (сост.),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работ по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в СССР 1958 - 1967 гг., Л.: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Наука”, 1978, С. 5.

境外把乌克兰身份认同公开化、合法化。1921 年在维也纳流亡的乌克兰侨民组建了乌克兰自由大学，二战之后在慕尼黑重建，得到巴伐利亚地方政府和联邦德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从流亡侨民大学变成冷战时代西欧著名的乌克兰研究中心，着力研究乌克兰历史、文学、文化、法律和政治。1992 年乌克兰教育部承认这所大学的学历，并对其提供财政支持。这所大学和所创办的学报性质的杂志，致力于整理被帝俄和苏俄所遮蔽的乌克兰文献。乌克兰自由大学教授波兰斯卡 - 瓦西连科 (Natalia Polinska - Wasylenko) 发表了《18 世纪南部乌克兰居民历史概论》(1940)、《乌克兰教会史》(1949)、《1768 年前扎波罗热史》(1953)、《10 ~ 13 世纪乌克兰 - 罗斯和西欧》(1964) 等文献。出生于利沃夫的乌克兰著名现代主义诗人乔治·卢茨基 (George Stephen Luckyj)，在加拿大参与创办了乌克兰研究所和加拿大斯拉夫学会。该所内设乌克兰历史研究中心，翻译了格鲁舍夫斯基的《乌克兰 - 罗斯史》，颠覆了俄罗斯国家史学观。把俄罗斯文明史推至公元 988 年罗斯受洗的史学观，始于塔季谢夫 (Василий Татищев) 身后才出版的《从古代到当下的俄国史》(1768 ~ 1843)、谢尔巴托夫 (Михаил Щербатов) 的七卷本《俄国史》(1770 ~ 1791)、卡拉姆津 (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 的《俄罗斯国家史》(1803 ~ 1826) 等官方史学家之说，他们根据《古史纪年》(1187) 之类古教会斯拉夫语文献，把“罗斯”含混成以“俄罗斯”为主体的斯拉夫民族或国家，认定这是一个有九百余年历史的民族和国家，公元 9 世纪围绕基辅所形成的罗斯就是俄国史的开端。格鲁舍夫斯基的著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罗斯受洗是以乌克兰民族为主体的东斯拉夫民族的共同历史，此前乌克兰民族就有自己的文明史，此后乌克兰尤其是西乌克兰走向融入欧洲的历史。1992 年该所推出由乌克兰自由大学教授波季奇尼 (Peter J. Potichnyj) 和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史教授拉伊夫 (Marc Raeff) 等主编的论文集《在历史中相遇的乌克兰和俄国》，声称“乌克兰和俄国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在过去和现在很少有机会彼此坦诚讨论共同的问题，这样的可悲事实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诸多历史原因，使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缺乏对话。对发生在 1654 年双方民众的第一次有成效的对话，实际上语焉不详”。他们引用帝俄官方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言论作为根据，“在沙俄和乌克兰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定》谈判中，乌俄互不理解且互不信任，双方在共同关系上都没有说出他们想要的和他们所不希望做的”。在沙赫马托夫院士 (Алексей Шахматов) 等推动下，1905 年帝俄科学院出版报告称，乌克兰语不是俄语的方言，而是一种有相当文学规模且不同于俄语的

斯拉夫语言，但“整个20世纪很少有俄罗斯知识分子严肃面对乌克兰问题，当代俄国人不把乌克兰问题视为重要问题”，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彼得·司徒卢威（Пётр Струве）亦然^①。

1945年1月在爱丁堡举行成立“大不列颠乌克兰协会”大会，此后不断有乌克兰裔英国人加入其中，1954年创办《乌克兰评论》，到1990年活跃成员约4700人，到2018年注册登记成员达近3万人^②。这份杂志，在冷战时代发表了大量关于乌克兰语言、文学、历史和宗教的研究之作。纽卡索大学教授桑德斯（David Saunders）1985年出版的《乌克兰人对俄国文化的影响，1750～1850年》，研究波兰-立陶宛联邦被瓜分后，帝俄如何借助书报刊审查制度，用俄罗斯文化改造已相当欧化的乌克兰文明。而乌克兰人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得不改进对俄国的理解，无论是南部知识阶层还是北部的侨民精英，在19世纪30年代之后都难以在“官方民族性”意识形态下表达对乌克兰文化的认同，果戈理的矛盾就源于此；受到已欧洲化的波兰文明之影响，乌克兰文化在许多方面先进于俄罗斯，包括沙霍夫斯科伊（Александр Шаховской）的戏剧和谢尔盖·格林卡（Сергей Глинка）的小说等，显示出乌克兰作家的浪漫主义文学仍潜在影响着俄国文坛^③。

1950年纽约乌克兰侨民创建了美国乌克兰文理学院（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 S. A.），旨在促进美国的乌克兰文化研究。1961年该学院有了自己的图书馆，收藏关于乌克兰的书籍和档案5.5万件。学院创办出版社和《美国乌克兰文理学院年鉴》，刊行奇热夫斯基的《乌克兰文学史》等作品，对推动“乌克兰文学”概念之建立及其在西方世界传播功莫大焉。第二任主编舍维洛夫（George Shevelov）刊行五卷本《乌克兰语的历史音系学》，主编了乌克兰文和英文《乌克兰百科全书》。他是乌克兰侨民作家语言学会创建人，1991年始任乌克兰科学院海外院士。

在美国更著名的乌克兰研究机构是1973年6月哈佛大学依托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创办的乌克兰研究所；1957年美国就出现乌克兰研究学会，1968年哈佛大

^① Peter J. Potichnyj, Marc Raeff etc. (ed.), *Ukraine and Russia in Their Historical Encounter*,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Studies Press, 1992, p. ix - x.

^② <https://www.ukrainiansintheuk.info/eng/03/augb-e.htm>, 访问时间：2023年5月1日。

^③ David Saunders, *The Ukrainian Impact on Russian Culture, 1750-1850*, Edmonton: 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 1985, p. 234.

学得到乌克兰侨民基金资助，设立乌克兰历史讲席，1970 年乌克兰研究开始每周开设讲座，1971 年创建乌克兰暑期学校，1973 年 6 月正式成立乌克兰研究所，为哈佛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学、历史、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政治学、神学、社会学等课程，每周举办学术报告会、论坛、电影、艺术展。该所图书馆很快成为西方收藏乌克兰文献和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中心。1977 年该所创办《哈佛乌克兰研究杂志》（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Journal），出版系列乌克兰研究丛书。

帝俄/苏俄制造出的乌克兰问题、衍生出的乌克兰文学被书报刊审查制度所掩饰，使其淹没于“俄罗斯文学”之中。但是乌克兰侨民在西方创办大学、研究所、杂志、出版社、研究会、博物馆，为系统化搜集相关资料、大规模探讨被俄国掩盖了的“乌克兰文学”提供了基础。

冷战时代西方斯拉夫学所建构的乌克兰历史和文学

苏联关于乌克兰历史及其和俄罗斯关系的论述，垄断着苏联和东方阵营对乌克兰的认知。然而，面向乌克兰侨民学者开放的西方斯拉夫学乌克兰研究，则着力探讨乌克兰史学真相。《哈佛乌克兰研究》杂志发表大量关于格鲁舍夫斯基及其乌克兰历史研究的文献，让世人知道这位史学家的传记：他受家学熏陶，在基辅大学历史—语言文学系就读期间，发表《从雅罗斯拉夫去世到 14 世纪末的基辅领土历史概论》，大学毕业后先后任职于基辅大学、利沃夫大学，在《基辅国家》月刊、《舍甫琴科学术研究会通讯》等发表论文。1894 年他在利沃夫大学创办“东欧史视野下的全球史”教研室，出版《乌克兰—基辅罗斯史料学》等。二月革命后，他的命运因参加政治活动沉浮不定，但其著作《乌克兰—罗斯史》对乌克兰人而言，类似于捷克史学家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的五卷本《捷克和莫拉维亚的捷克民族史》之于捷克人那样具有无可替代的伟大价值，引发侨民学者对格鲁舍夫斯基遗产乃至乌克兰语言文学的发掘和整理。

乔治·卢茨基 1951 年参与创建纽约的美国乌克兰文理学院并任《美国乌克兰文理学院年鉴》主编，还创办和主编《加拿大斯拉夫研究论文》（1956～1961）；1957～1961 年任北美斯拉夫语言文学学会主席，1976 年参与创建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1976～1982 年作为副所长主编《乌克兰研究杂志》，是《乌克兰百科全书》的创意人，刊行广为流行的教材《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学》，翻

译格鲁舍夫斯基那部皇皇巨著。出生于乌克兰赫尔松州哥萨克家庭的乌克兰著名活动家多罗申科（Dmytro Doroshenko），1919年流寓欧洲，任乌克兰自由大学历史学教授、柏林乌克兰科学研究所所长、华沙大学教会史教授，194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任乌克兰自由科学院院长，1947年移民加拿大，在温尼伯圣安德鲁学院任乌克兰史和文学教授，与乌克兰侨民学者共同创建加拿大乌克兰自由大学分部，其间推出《乌克兰历史学概览》（1957）、《在历史和政治之间：论乌克兰历史和文学批评》（1973）、《乌克兰文学史》（1975）和《不和谐的声音：非俄罗斯的苏联时代文学，1953~1973年》（1975）、《反思乌克兰史》（1981）等著作。他注意到，19世纪30年代后，乌克兰史学家德米特里·班德施-卡缅斯基（Dmytro Bantysh-Kamensky）和米哈伊尔·马尔克维奇（Mekola Markevych）用乌克兰立场解释“小俄罗斯”概念，以图消解帝俄官方所推崇的“小俄罗斯祖国（Little Russian Fatherland）”概念，发现在“哥萨克”这个族群出现之前乌克兰历史就已存在，并且乌克兰人性格是在基辅罗斯时期确立的，因为帝俄当局禁止“乌克兰”这个词，乌克兰裔学者不得不用“西南罗斯”或“小俄罗斯”以逃避审查；基里尔兄弟及其所创立的教会斯拉夫字母和乌克兰的独特关系，已被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科斯托马罗夫（Mykola Kostomarov）所注意，开始关注独立的乌克兰文化及其历史和所拥有的政治特征；但帝俄禁止用乌克兰语书写，作为标准语的乌克兰语不可能得到发展；到苏维埃时代，乌克兰语更被严格限制，苏联当局把认同乌克兰身份者视为民族主义分离分子，查禁把乌克兰视为主体民族的史学著作^①。

这样的史学考察，对理解乌克兰文学何以消失于帝俄文坛意义重大。后来成为毕晓普大学教授的梅弗尔（Ivan Myhul），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题为《苏联乌克兰的政治与历史：乌克兰史学研究，1956~197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从史学史角度辨析乌克兰在苏联史学中的境遇。出生于乌克兰西部的胡恩扎科（Taras Hunczak），是以力作《从伊凡雷帝到十月革命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著称的罗格斯大学乌克兰史学教授，在《乌克兰，1917~1921年》中探讨俄罗斯帝

^① Dmytro Doroshenko, A Survey of Ukrainian Historiography; Alexander Ohloblyn, Ukrainina Historiography, 1917-1956, in *The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 S.*, Vol. 5-6, 1957.

国解体后乌克兰短暂的独立史^①。阿尔伯塔大学乌克兰裔学者卢登茨基 (Ivan L. Rudnytsky) 发表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 如《现代史上的乌克兰角色》《波兰 - 乌克兰关系: 历史的重负》《现代乌克兰的思想起源》等。他移居美国后, 先后担任威斯康星大学、拉塞尔大学和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阿尔伯塔大学教授, 是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创建者之一。1966 年刊行的力作《东西方之间的乌克兰》声称, “乌克兰属于西方到这种程度, 它乃欧洲居民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此乃直观可见的地理上的事实”。就历史而言, “14 ~ 17 世纪的莫斯科公国主导的罗斯本质上不属于欧洲。众所周知, 只是在彼得大帝改革的惊醒下, 俄国才开始‘西方化’或‘欧洲化’。而这种欧洲化的实质, 却令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感到疑惑。乌克兰从未经历过类似于俄国历史上彼得大帝的粗野而激进的改革。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个国家从其最初开始, 在本质上就属于欧洲, 就不再需要用僵硬的、革命的手段去欧洲化”^②。这种观念史考察, 相当于对此前乌克兰著名史学家格鲁舍夫斯基《乌克兰 - 罗斯史》所论述的观点的进一步深化, 后者曾指出, 早在公元 988 年基辅接受东正教之前, 乌克兰文明史就已存在, 比俄罗斯历史更悠久, 且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乌克兰语, 比俄语书面语时间更长。这种论述在国立利沃夫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格里查克 (Ярослав Грицак) 《民族主义背后的激情: 用新范式表达的过去历史》中得到延续: 存有独立文化的乌克兰一直为独立而战, 1991 年成为主权国家, 正是不同于俄罗斯文明的欧洲文化之独立存在的结果, 乌克兰有进入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基础^③。

当然, 在冷战时代, 最为壮观的乌克兰研究是乌克兰文学研究。书报审查制度使得那些随着波兰 - 立陶宛联邦被瓜分而进入帝俄的乌克兰人, 遇到了保留民族身份和认同俄罗斯帝国之冲突问题。姑且不论以乌克兰语写作、堪称典范乌克兰作家的舍甫琴科, 就是不公开反对俄罗斯帝国的果戈理, 也一样保守着强烈的乌克兰身份意识: 一旦成名, 他便在《小品文集》中发表《小俄罗斯歌谣》(1833), 立即把乌克兰民间文学引进俄国的城市 and 上流社会。冷战时代的斯拉夫

^① Taras Hunczak (ed.), *The Ukraine, 1917 - 1921: A Study i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Ivan L. Rudnytsky, *Ukraine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Das Ostliche Mitteleuropa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6, p. 164.

^③ Ярослав Грицак, *Страсті за націоналізмом: стара історія на новий лад*. Київ: Критика, 2004.

学试图恢复这样的乌克兰文学真相。著名乌克兰文学和历史专家曼宁（Clarence A. Manning）撰写《乌克兰文学：主要作家研究》（1944）等，发掘舍甫琴科乌克兰语创作所表达的乌克兰诉求。美国阿卡迪亚大学斯拉夫学教授克康内尔（Watson Kirkconnell）给曼宁这部书所写序言声称，“有时候乌克兰被称之为‘斯拉夫世界里的爱尔兰’（the Irish of the Slavonic world）。这种不严肃的称呼未必不合适。在如是情形之下存在着古已有之的、近乎传奇的、荣耀的乌克兰传统，好几个世纪以来独立的乌克兰文学被俄罗斯扼杀了，由此其生活的发展也就近乎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在现代的浩浩荡荡的浑浊洪流中才显露出来”，《伊戈尔远征记》显示出的文学源流是基辅而不是莫斯科，丰富的爱尔兰民歌遗产非常类似于无以计数的乌克兰民歌，都反映着古老的悲伤，都有浓郁的宗教文学痕迹^①。如此比较视野，方便西方读者理解乌克兰文学的魅力。

当然，最为称道的是奇热夫斯基（Dmytro Chyzhevsky），他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1921年开始流寓欧洲并在乌克兰侨民所建的乌克兰高等教育学院和乌克兰自由大学执教，后转任德国哈雷大学和马堡大学、海德堡大学从事乌克兰语言文学和历史教学和研究，1949~1956年任职于哈佛大学，用德文撰写了《果戈理在俄国》（1939）、《俄国圣徒》（1959）、《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1961）、《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1964），用英文撰写了《比较斯拉夫文学概览》（1952），用乌克兰文撰写了《乌克兰文学史：从11世纪到19世纪末》（1975）。他按乌克兰史进程论述文学展开过程，包括接受基督教前有自己的口头文学传统；此后编年史显示出受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印欧文化影响，开始大量翻译希腊语书写的基督教文献，包括圣经和礼拜用书、启示录，也出现世俗文学、《约翰·马拉拉斯编年史》等，也把俄罗斯所看重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治家格言》纳入其中；14~15世纪更有编年史《基辅简编年史》《立陶宛编年史》等；16世纪乌克兰文学形成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讽刺诗和抒情诗发达；17世纪巴洛克时代出现《伊凡·韦森斯基》等戏剧，世俗化诗歌开始繁荣，历史文学也很流行；18世纪西乌克兰出现波赫丹诺维奇（Ипполит Боханови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Иван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奥西波夫（Н. Осипов）等用拉丁语书写的文学作品；19世纪初乌克兰文学繁荣，出现《美人鱼德尼斯特洛福娃雅》

^① Watson Kirkconnell, *Ukrainian Literature: Studies of the Leading Authors*, New York: Harmon Printing Hos, 1944, p. 4.

(1837) 等乌克兰民间文化, 波尔塔瓦人索莫夫 (Orest Somov) 的文学批评、马尔科维奇 (Mykola Markevyc) 的《乌克兰曲调》(1829)、果戈理及其同乡赫列宾卡 (Evhen Hrebinka) 的创作, 他们以不同方式表达乌克兰情怀; 哈尔科夫大学出现首个乌克兰浪漫主义流派, 19 世纪 20 年代大学生们聚集在当时也是大学生、后来成长为著名哲学教授的斯列兹涅夫斯基 (Измаил Срезневский) 周围, 在热烈讨论德意志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同时, 也对乌克兰存在和发展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并热心研究乌克兰民歌; 文学家科斯托马托夫 (Микола Костоматов) 等发展出西乌克兰浪漫主义; 40 年代基辅大学出现浪漫主义作家马克西莫维奇 (Myxajlo Maksymovec)、舍甫琴科, 东乌克兰还出现科内希基 (О. Коньський) 等写实主义作家^①。要看到, 按欧洲文学史概念建构乌克兰文学史, 能发现“18 世纪乌克兰民族意识复兴”、“乌克兰感伤主义”的乌克兰身份意识。该作描述的乌克兰文学如此丰富多彩, 但碍于帝俄/苏俄内部殖民治理, 使之消失于俄国文坛中, 由此卢茨基翻译这部《乌克兰文学史》时在序言中抱怨, “世界上讲英语的人要认识乌克兰文学, 受限于文学作品翻译严重不足、欠缺理解和英语的现代乌克兰文学史”^②。

卢茨基教授的乌克兰文学研究同样令人称道。他在《苏维埃乌克兰的文学政治学, 1917~1934 年》中研究苏维埃政权意识形态和乌克兰文学之冲突、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自决和文化繁荣的政策及与乌克兰主张自己文化独立的矛盾。他指出, 1917 年少有乌克兰人追随布尔什维克, 乌克兰也没有统一的布尔什维克组织, 但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哈尔科夫和基辅等地用阶级斗争替代民族自觉的叙事策略为乌克兰人建立苏维埃组织, 按布尔什维克政权要求运行, 并在莫斯科资金和意识形态支持下, 压制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 从而使苏俄内战延伸到乌克兰, 并影响到乌克兰文化精英, 甚至在西部乌克兰也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强调文学苏俄化, 如仿照苏俄建立各式作家组织, 用布尔什维克文化政策解释文学。如是探讨让读者明了: 乌克兰作家在帝俄末期以后的突然转向, 是因为乌克兰一直有反对帝俄的情绪, 而这被苏维埃政权用红色意识形态渗透并加以利用。

^① Dmytro Cyževs'kyj, *A History of Ukrainian literature, from the 11th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rans. by Dolly Ferguson, Doreen Gorsline, and Ulana Petyk; edited and with a foreword by George S. N. Luckyj. Littleton, Colo.: Ukrainian Academic Press, 1975.

^② Ibid., p. ix

卢茨基的著作《在果戈理和舍甫琴科之间：文学乌克兰中的极性，1798 ~ 1847年》作为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丛书之一，导言开宗明义，“试图在独特文化困境的语境中查考他们的关系。这个困境乃我们探讨的中心，它主导着 19 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生活；至今仍未得到满意的解决。困境包括：乌克兰被俄国政治同化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并在 18 世纪完成，继而其文化要融化于‘俄罗斯海洋’？果戈理的回答是明确的 yes，其传记和作品展示了这种过渡。而舍甫琴科的回答是 no。与许多预测相反，他成功地奠定了现代乌克兰文学，并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容”，但果戈理或舍甫琴科本人及其后裔并没自觉意识到这种文化分裂和冲突，如 19 世纪 30 年代果戈理仍主张俄罗斯优先于乌克兰，在 40 年代之前舍甫琴科明显反对这种立场，他们是同时代人，舍甫琴科较早地采用了乌克兰知识分子认知。“舍甫琴科之后，果戈理的观念在乌克兰黯然失色，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主张不应该忽视这两个人物之光谱的无限复杂性，“他们各执一端，他们也有许多交集。这不仅因他们都是乌克兰人，共享哪怕不是同一的，也是类似的文化遗产。他们都主张无限且须有更高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性的目标”。果戈理把乌克兰视为俄国的一个州，而舍甫琴科则彰现代乌克兰作为主体民族的特性。乌克兰侨民学者在冷战时代，夹杂着西方价值和乌克兰民族主义，“随着历史进程，果戈理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降低，他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则根本不被自由讨论。舍甫琴科的写作生涯持续到 1847 年被抓捕，此后他的观点实质上没有变化，但他后期创作却必定被严重忽视”；果戈理和舍甫琴科在苏联时代分别被讨论得特别多，但皆遭到“去乌克兰化”的阐释。“乌克兰文学的兴起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兴趣相关。它始于尼古拉一世统治最初十年，当时正值政治倒退加剧期”，十二月党人很少涉及乌克兰和波兰抗议俄罗斯化政策加剧的历史，“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老大哥和小老弟这样的认知，至今仍是主流的。俄罗斯人鼓励表达‘小俄罗斯’民族的角色，推动把乌克兰主题引入俄罗斯文学。乌克兰人充分利用这类机会而未要求更多。乌克兰中上层普遍接受了俄语，乌克兰农民则始终使用乌克兰语，但后者没有发言权。自乌克兰知识分子掌控文学和审美的两种有效性资源，即语言和民间文学以来，他们的影响也就缓慢地壮大起来”^①。如此深刻分析，让人们认识到乌克兰

^① George Stephen Nestor Luckyj, *Between Gogol and Sevcenko: Polarity in the Literary Ukraine, 1798 - 1847*. Munchen: Vilhelm Fink Verlag, 1971, p. 7, 8, 88.

文学在帝俄/苏俄垄断话语权下的复杂情形，也认识到侨民学者探讨乌克兰文学的开拓性、深刻性。

二战期间移居到欧洲的乌克兰语言文学家舍维洛夫 (George Shevelov)，曾获得慕尼黑乌克兰自由大学教职，1952 ~ 1954 年任哈佛大学讲师，1954 年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和教授，撰写了《20 世纪乌克兰语问题》。在该作中他声称，“在一个多语言的社会，一个人选择什么语言有法律、政治、历史、人类学等条件限制。乌克兰尤其如此！乌克兰社会的大多数人被少数或多个少数族裔所统治（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所统治），语言问题不仅是直接的语言学问题，而且经常主要是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要理解乌克兰语的地位和特点，就需要与这个复杂区域的多种语言联系起来，而非仅和书面语关联”，因为乌克兰语问题本质上是与不同时代统治乌克兰不同区域的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等相关联的，这些不同族裔人的语言，凭借其话语权使自己的语言影响乌克兰语的词汇、词法和句法，这些语言现象复杂^①。这样认识乌克兰语，意味着苏联官方学术界把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当作俄语方言之谬误，但苏联语言学史家警觉地意识到这样对待帝俄时代语言学史问题之危险，要求“对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和俄语关联，在历史比较中进行。许多人因此把它们当作方言研究”，并批评波捷布尼亚等乌克兰裔和白俄罗斯裔语言学家在研究这类语言过程中明显表现出民族独立意识^②。

西方斯拉夫学中的乌克兰历史和文学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获得反哺母国的机会。1988 年 6 月 4 ~ 15 日，苏联和美国乌克兰学家在基辅和利沃夫举行“古乌克兰文学和现代乌克兰文学之形成”双边学术会议，乌克兰科学院舍甫琴科文学研究所所长 Н. А. 泽维尔 (Г. А. Зевелін) 院士声称，新思维改革使科学研究乌克兰文学史有了可能性，能正视那些“空白”、探讨古基辅罗斯文学对现代乌克兰文学之影响。会议发表 9 篇报告，内容涉及 1726 年至 19 世纪初乌克兰精神生活的进展、基督教进入罗斯和古代乌克兰文学的发展、对长歌《艾涅伊

^① George Y Shevelov,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the Ukra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00 – 1941)”, *Harvard Ukraine Studies*, No. 1 – 2, 1986, pp. 71 – 74.

^② И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ред.),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с 1825 – 1880 г. Выпуск 7. М.: Изд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8, С. 3 – 4.

达》(Енеїда) 研究中某些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古代乌克兰文学作品中对罗斯推行基督教的反应、乌克兰近代文学形成中体裁和风格的功能、18 世纪后半叶乌克兰文学语言体裁和风格的发展等。加拿大学者 P. 马戈奇 (Paul Robert Magocsi) 认为, 认识乌克兰民族历史发展经历搜集文化遗产阶段、组织阶段 (文化组织、组建博物馆、开办学校)、政治阶段 (组建政党和政治组织)。会议通过决定: 这次讨论会成果于翌年编辑专集出版、苏联学者将参加 150 卷本《哈佛大学乌克兰文学作品馆藏》工作、组建国际乌克兰学家协会。

可见, 这种斯拉夫学中的乌克兰研究, 一旦时机成熟, 就能推动苏联正视乌克兰文学的存在, 在事实上助力回归文学浪潮, 也让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自觉有了深厚的历史资源。

“乌克兰文学”生机盎然 与冷战结束后西方斯拉夫学发展

苏联解体后, 独联体框架无法限制中亚五国、高加索三国和斯拉夫三国各自的主体民族化和国家化历程,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转型无论负荷了怎样沉重的帝俄/苏联各方面遗产, 负重前行, 也在所不辞。出生于顿巴斯、1953 年毕业于基辅大学、1957 年以来任职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克雷姆斯基教授 (Сергей Крымский) 声称, “现在乌克兰正经历着民族国家复兴, 就如当代世界其他国家一样, 不是悬于简单地修复过去时代的文化成就之上。它特别要求不是把历史作为对过去的回忆, 而是要唤醒那些对民族国家来说有普世性意义的过去”, 需要澄清“基辅罗斯”这个概念所夹杂的晦暗不明之意, 正如古希腊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还有《荷马史诗》, 乌克兰文明的历史使命包括哥萨克这一草原骑士^①。他的著作借助斯拉夫学成果, 重新发掘被俄罗斯所压抑的乌克兰历史及其人物马泽帕等, 深入探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对乌克兰政治的改造, 提出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是否承载乌克兰现代主义文学荣光之类重要问题。所幸, 冷战时代美国始终没有囿于“苏联”概念而把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

^① Сергей Крымский, Универсалии украи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стория не как воспоинание о прошлом, а как подвиг пробуждения//Лариса Жаловага (ред.), Две Руси: Украина Incognita. Киев: ЛОЗТ “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есс – группа”, 2004, С. 424.

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视为苏联的少数族裔，因为西方斯拉夫学建构出了不同于苏俄关于这些主体民族的历史、语言和宗教等知识谱系，而苏联为了争取更多话语权，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具有联合国会员国席位。这种阴差阳错，就使得冷战时代斯拉夫学成果，自冷战末期以降反而为原苏联空间各国提供了知识、思想；同样，卢茨基声称，“只有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学者才意识到原苏联国家的多种民族的历史重要性。他们甚至承认非俄罗斯民族的‘张力’和‘冲突’促成了苏联解体。乌克兰人作为苏联帝国中最大的非俄罗斯民族，被视为俄罗斯‘小弟’或‘小伙伴’。在相当程度上，这种观点未必就错。在三百年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中，‘老大哥’确实强力主导着乌克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他还指出，19 世纪帝俄当局严厉限制乌克兰语言文学，如 1876 年 5 月 30 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巴德-埃姆斯城发布《埃姆斯御令》（Эмский указ），“国君鉴于出现乌克兰活动，尤其是用小俄罗斯语言刊行教材和祷告翻译”，授权内务部、国民教育部和至圣主教公会限制对乌克兰语的运用和教学（这个御令一直持续到 1905 年）。乌克兰文化在帝俄发展得缓慢，损失惨重（包括果戈理、柯罗连科等乌克兰作家，被迫选择用俄语写作），但仍未充分俄罗斯化。18 世纪乌克兰就出现巴洛克杰作，而舍甫琴科、米哈伊尔·科斯特马洛夫等乌克兰浪漫主义反叛者，奠定了 19 世纪上半期乌克兰新文学基础（他们多采用乌克兰农民语言写作）”^①。这些植根于乌克兰文化和历史记忆的作家，无端地失去在俄国文坛的地位，完全不能和俄罗斯作家相媲美，还被别林斯基忽视甚至攻击。如是揭示出乌克兰史真相，对后苏联时代乌克兰重建主体民族，意义非同小可。

鉴于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合法地成为主权独立国家，而现实中转型面临着历史的重负，包括要在俄语信息茧房中发掘乌克兰史学家的遗产、清理苏联关于乌克兰历史的论述、建构乌克兰认同等。这些本来就是冷战时代主要由乌克兰侨民组成的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阿尔伯塔大学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等着力探讨的论题。在冷战结束后，这些机构和各著名学府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乌克兰研究学者，自动地承续着苏联解体之前的学术传统，研究影响现实的重大历史问题。由于沙俄/帝俄/苏俄所制造的乌克兰问题不是单一的，而俄联邦又缺乏后殖民批评

^① George Luckyj, “Mykola Khvylovy: A Defiant Ukrainian Communist”, in Katherine Bliss Eaton (Ed.), *The Destruction of Soviet Literary, Theater, and Film Arts in the 1930s*.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5.

意识，在认识和处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原苏联空间国家及其语言、文学艺术、文化遗产、俄侨和政治、经济、安全等问题时，仍然沿袭沙俄/帝俄/苏联传统，按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中心教授利文（Anatol Lieven）所声称的，“乌克兰本身就拥有多重身份认同，不能用某种认同统辖之，或冒着分裂国家之风险，将其拽上某一种地缘政治方向”^①，这也就导致冷战结束后斯拉夫学界对清理乌克兰历史和文化问题，更多的是采用跨学科的后殖民批评方法，解读俄国不同时代对乌克兰的论述。现任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所长乌克兰裔浦洛基（Serhill Plokhly）教授，原本是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教授，1996年就任阿尔伯特塔大学讲座教授，在此创立研究乌克兰宗教文化项目，2007年转任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讲座教授，2013年开始任所长，这么多年来他不断推出力作，包括《现代乌克兰早期的哥萨克和宗教》（2002）、《历代沙皇和历代哥萨克：肖像研究》（2002）、《现代乌克兰的宗教和国家》（2003）、《斯拉夫诸民族的起源：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前现代认同》（2006）、《乌克兰和俄国：对过去的描绘》（2008）、《哥萨克神话：帝国时代的历史和国家》（2014）、《欧洲的大门：乌克兰史》（2015）、《失落的王国：对帝国和建构俄罗斯国家的探讨》（2015）、《乌克兰和欧洲：文化接触和博弈》（2017）、《历史和故事中的乌克兰：乌克兰知识分子散论》（2019）、《乌克兰战争：回到历史》（2023）等引发斯拉夫学界乃至西方、乌克兰、俄罗斯关注的力作。其中，《恢复帝俄真相：米哈伊尔·格鲁舍夫斯基与乌克兰历史书写》（2005）重新叙述格鲁舍夫斯基这位最伟大的乌克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传记，热心于论述这位史学家的《波兰 - 乌克兰与加里茨基之关系》（1905）、《乌克兰问题》（1907）、《俄国解放与乌克兰问题》（1907）、《乌克兰民族的过去与现在》（1914）、《16 ~ 17 世纪乌克兰的文化民族精神》（1919）、《乌克兰文学史》（1924）、卷帙浩繁的《乌克兰 - 罗斯历史》（1898 ~ 1936）等如何以乌克兰主体性认知挑战帝俄/苏联对乌克兰的叙事，认为这种史学观，揭示出帝俄/苏联史学家把乌克兰作为少数民族之内部殖民主义的实质，批评归化俄罗斯的乌克兰史学家林尼琴科（Иван Линниченко）力作《罗斯和波兰之相互关系》（1884）、《小俄罗斯问题和小俄罗斯自治：致格鲁舍夫斯基公开信》（1917）和《小俄罗斯文化》（1919）等所主张的观点，西部罗斯人（白俄罗斯人）、西南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北罗斯人（俄罗斯人）有同等权力，因为

^① Anatol Lieven, “Ukraine: the Only Way to Peac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 May 2014.

他们共同组成了俄罗斯帝国居民^①。《斯拉夫民族起源：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前现代认同》明确现代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起源不同于俄罗斯，前者更多源自欧洲文明，现代俄罗斯则仍沿袭正教会和拜占庭、在蒙古遗产基础上接受欧洲文明，所谓“斯拉夫兄弟”是没有更多文化价值之说^②；《哥萨克神话：帝国时代的历史与国家》（2012）探讨俄罗斯帝国对乌克兰的内部殖民，制造出了这个群落，又为帝国殖民扩张提供了军备力。诸如此类研究，对乌克兰历史中重要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新历史主义探讨，论题及其论述方式、所得结论，和帝俄—苏联—俄联邦的认知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但更契合作为主体民族的乌克兰建构自己国家和认同所需。

卢茨基在冷战结束后的乌克兰研究，同样特别体现出承续苏联解体之前的学术传统，包括选编《暴风雨之前：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乌克兰小说》（1986）、《保持记录：1930 年代苏维埃乌克兰文学大清洗》（1991）、《青年乌克兰：圣西里尔和圣麦托丢，845~1847 年》（1991）、《关于乌克兰思想史：乌克兰思想文选，1710~1995 年》（1996）、《舍甫琴科的不可遗忘之旅》（1996）、《米哈伊尔·霍霍尔感到的痛苦也就是尼古拉·果戈理的极度痛苦》（1997），以及文学批评著作《苏联时代乌克兰的文学政治学，1917~1934 年》（1990）、《在果戈理和舍甫琴科之间：1798~1847 年文学乌克兰的两极》（1998）。前者是在学位论文基础上写就的，论述乌克兰文学家在苏联时代的复杂叙述；后者论述这两位作家在乌克兰认同和俄罗斯帝国作家身份上所表现的巨大差别。尤其是，《20 世纪乌克兰文学：阅读指南》（1992）深刻指出，“即便是 19 世纪初以来的乌克兰文学，也曾是民族身份的一种表达，唤醒了民族意识。在舍甫琴科的浪漫主义诗歌中就闪耀着这种民族意识，哪怕 1863、1876、1881 年沙皇御令禁止乌克兰出版物问世，但热爱舍甫琴科的读者规模极为壮观，因奥匈帝国管辖的西乌克兰能刊行乌克兰文学，还可以把这些作品传播到东乌克兰。这种文学的指导思想流行甚广，其风格是现实主义的，出色地描写了底层农民的生活，甚至也促成 19 世纪末乌克兰

^① Serhill Plokyh, *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etc.: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② Serhii Plokyh, *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 Premodern Identities in Russia, Ukraine and Belar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文学出现了现代主义新趋向”^①。卢茨基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乌克兰文学带来的创伤、从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到戈尔巴乔夫重建苏联的乌克兰文学、西乌克兰文学和乌克兰移民的流散文学。卢茨基如此高产，是基于表达对母国的情怀，实现斯拉夫学的使命，从而对俄国—乌克兰历史和文学进行后殖民批评的检讨，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乌克兰文学之实质。

独立后的乌克兰，关于建构什么国家的争论从未间断。2008年剑桥大学现代和中世纪语言学院依托斯拉夫学系创设剑桥乌克兰研究所，由罗里·芬宁（Rory Finnin）博士领导，常和国际重要媒体合作，把专业的乌克兰之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问题探讨变成公共话语。如2014年10月通过BBC传达“乌克兰与全球信息战”，深度分析乌克兰危机背后俄国和乌克兰之间所展开的信息战；推出《民族主义与抒情；或者塔拉斯·舍甫琴科如何对死去的、活着的和未出生的同胞讲话》（2011）、《超越“国家叙事”：战时乌克兰的文化生产者 and 多语言主义》（2022）等力作。同样，澳大利亚乌克兰学会创始会长、莫纳什大学乌克兰研究系主任帕夫雷申（Marko Pavlyshyn）教授《选择欧洲：安德鲁·霍维奇、别兹德鲁科和新乌克兰文学》（2009）声称，“在乌克兰就如生活在别处（elsewhere），苏联时代导致许多作家失去文化方位。作为写作的共同体意识到政治并未控制住全部，高级文化未必都被政府所垄断，也不完全是国家所创建，但许多作家对此沉默不语”^②。换句话说，必须把当代乌克兰文学置于恢复乌克兰文学遗产的过程中理解。先后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马尔什（Rosalind Marsh），作为巴斯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和女性研究中心主任，在苏联解体不久组织了“俄国和苏联的女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约克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奥卢尔克（Shane O’Rourke）博士发表关于1860~1914年顿河哥萨克女性报告；乌克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萨洛玛·帕夫雷奇科（Solomea Pavlychko）发表了《后苏联乌克兰社会中的女性主义》，作为研究者和参与者运用第一手材料，梳理乌克兰女性在苏联体制失败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和女性意识之形成问题；毕业于罗格斯大学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印度瓦尔帕莱索大学副教授

^① George S. N. Luckyj, *Ukrainian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ader’s Guide*. Toronto, etc.: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p. 3.

^② Marko Pavlyshyn, “Choosing a Europe: Andrukhovych, Izdryk and the New Ukrainian Literature”, *New Zealand Slavonic Journal*, 2001, pp. 37–48.

曼尼亚·鲁布恰克 (Manian J. Rubchak), 发表《基督圣女和异教女神: 乌克兰女权主义与永恒的女性主义》, 用后殖民批评检讨东正教审美中崇拜圣母玛丽亚和苏维埃制度下女性问题政治化、乌克兰女性遭遇的问题, 以及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文学要面临的转型问题^①。西方斯拉夫学界关注现实中的乌克兰进程: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 在独立后的乌克兰, 亲欧洲/亲俄国的政治力量冲撞不断、社会撕裂严重。华沙大学教授亚历桑德拉·戈纳丘克 (Ola Hnatiuk) 深切感受到这种紧张, 便在长文《本土派 vs. 西方派: 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文学的文化认同问题》(2009) 中声称, “1991 年乌克兰获得独立之后, 就发生了关于乌克兰文化导向变化之争, 尤其是 1997 ~ 1998 年这个世纪之交的激烈争论, 导致乌克兰知识分子分化, 虽然有库奇马再度竞选总统的政治和社会氛围, 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分裂已显示出迹象”, 形成现代派人士对抗传统派人士、东西方对抗之局势, 欧洲或亲欧洲, 反对亲东方即亲俄国, 学术界、新闻界和其他专家都参与了这一分裂过程。本土派不敌视俄国文化, 20 多年来始终没有建立统一的乌克兰民族认同, 原因除苏联遗产外 (乌克兰有 800 万俄罗斯侨民, 并且强烈表达俄国认同, 虽然他们是乌克兰国民; 1/3 乌克兰人俄罗斯化或去乌克兰化, 俄语成为交际的主要语言; 乌克兰没有发生革命就获得独立, 使得苏联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仍在乌克兰绝大多数地区运行, 尤其是乌东), 还在于找不到共同的乌克兰文化资源^②。这种体现在社会结构、身份认同和政治话语等方面的社会张力, 表现在文化各个领域, 由此罗格斯大学乌克兰文学和比较戏剧专家拉里萨·奥普什科维奇 (Lazrissa Onyshkevych) 和华盛顿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访问讲师玛丽亚·列瓦科维奇 (Maria Rewakowicz) 主编《欧洲文化地图上的当代乌克兰》(2009), 探究当代乌克兰基于历史断层的纷争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分化问题, 以及向往欧洲之大势及其在当代乌克兰文学文化认同上的显示, 还有戏剧传达西方审美观、女性在国家认同和文学话语上的选择等表现出的西方化。1999 年从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的波兰科学院斯拉夫部资深研究员、华沙大学教授斯捷凡诺夫斯卡 (Lidia Stefanowska), 在《回到黄金时代: 20 世纪

^① Rosalind Marsh (ed.), *Women in Russia and Ukra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05 - 330.

^② Ola Hnatiuk, “Nativists vs. Westernizers: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Ukrainian Literature of the 1990s”,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Vol. 50, No. 3, 2006, pp. 434 - 451.

90年代加里奇语中的怀旧话语》(2009)中敏锐指出,基于历史原因,西乌克兰已参与欧洲文明,对自身欧洲历史的再发现,宣称加里奇语属于拉丁语,自从接受基督教以来就已西方文明化,西乌克兰人怀念属于波兰一部分的时代,这种语言上的西方属性,不同于乌东地区把乌克兰语当作俄语方言,可能更体现乌克兰语言的前景^①。

既然文学对理解乌克兰社会进程如此重要,而独立后的乌克兰学术界不再面临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限定,他们的研究也就很容易被斯拉夫学界所采纳,促成斯拉夫学界中的乌克兰研究专家选编和翻译重要的乌克兰文学作品。乌克兰科学院文学批评家帕夫利奇科(Соломія Павличко)1990年代初作为富布赖特学者留学阿尔伯塔大学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连续推出《思想的鲑鱼:转折点上的乌克兰文学》(1994)、《面对自由:新乌克兰文学》(1996)。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乌克兰研究讲座教授纳丹(Michael M. Naydan)选编《当代乌克兰女性小说家》(2011)、《多元历史:新乌克兰女性之间作品选》(2018),让读者看到乌克兰独立以来女性诗人和作家对乌克兰历史进程的书写;他在此基础上著述《理解乌克兰的文学和历史资源》(2022),探讨通过乌克兰文学理解乌克兰社会进程的意义。两位乌克兰诗人马克西姆丘克(Oksana Maksymchuk)和罗索钦斯克(Max Rosochinsk)选编《战争用语:乌克兰新诗人》(2017),让读者看到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乌克兰诗人对乌克兰社会危机的书写。这些作品使读者通过当代乌克兰文学了解到乌克兰社会制度转型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关注这类问题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变化情况。

可见,独立后的乌克兰虽然纷争不断,但得益于西方斯拉夫学超越俄语文献而建构的“乌克兰”知识谱系,从而能对乌克兰作为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进行后殖民批评,指出乌克兰人在地域、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等皆属于典型的欧洲“大国”,这种情形在文学上有更复杂的呈现,进而也就使乌克兰成为斯拉夫学界仅次于俄罗斯的重点研究区域。

总之,原本极富全球和区域治理经验的帝俄/苏联,给当代俄罗斯留下了丰

^① Lidia Stefanowska, “Back to the Golden Age: The Discourse of Nostalgia in Galicia in the 1990s”, in Zaleska, Larissa M. L. and Maria G. Rewakowicz (eds.), *Contemporary Ukraine on the Cultural Map of Europe*. Armonk, N. Y.: M. E. Sharpe, Inc.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hevchenko Scientific Society, 2009, p. 219 – 230.

富的国际政治遗产，如苏联解体过程中建立了半实体化的独联体，重新强化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共同的斯拉夫世界；随其后苏联进程的延续，斯拉夫世界危机不断，俄国把帝俄时代的“斯拉夫世界”（Славянский мир）概念改造为“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即俄罗斯文化惠及斯拉夫民族兄弟而且俄罗斯常常被代之以“罗斯”（русь），习焉不察地把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混为一谈。这也使得成为主权国家的原苏联空间各国，仍面临着统一的“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俄罗斯文化之挤压。殊不知，早在苏维埃政权于乌克兰建立和稳定过程中，就有大批乌克兰人流寓欧美，在寓居国开启系统研究乌克兰历史、语言、文学和宗教之先河。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持续，阿尔伯塔大学、哈佛大学等创办乌克兰研究所，西方许多重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增设乌克兰语言文学课程，这就孕育出斯拉夫学的分支即乌克兰研究，从业者热心于跨学科研究乌克兰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宗教等，为乌克兰保留主体民族记忆、重建自我，提供了知识储备和思想资源。苏联解体后斯拉夫学中的乌克兰研究就尝试着把乌克兰社会进程所遇到的问题置于历史处境中观察，从而召唤着西方社会关注乌克兰转型、乌克兰与欧洲或俄国的关系等问题。这样的乌克兰研究成果与俄罗斯关于乌克兰的论述相去甚远，如论及帝俄时代或苏联时代乌克兰裔作家的写作，不是把“乌克兰”作为俄罗斯文学的题材观察，而是探讨是否可能表达或如何表达“乌克兰身份”诉求。这样的研究成果一旦合法进入乌克兰，便颠覆了 1991 年之前的乌克兰人主要是通过苏联所建构的乌克兰知识谱系了解自己的认知模式（帝俄时代就没有“乌克兰文学”，苏联时代“乌克兰文学”被作为伟大而辉煌的俄罗斯文学一部分）。

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建立过程中被迫流亡欧美的乌克兰侨民知识分子，构成了西方斯拉夫学中乌克兰研究的最初队伍，他们把乌克兰文学作为专门的文学现象从俄罗斯文学中分解出来，不仅仅有助于还原乌克兰作为主体民族和国家的地位，而且颠覆了长达三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所建立的统一的“俄罗斯文学”概念，这些连同乌克兰侨民所保留和彰显的乌克兰身份之行为一道成为共同推动乌克兰作为主体民族之意识的形成、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而 2022 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兵戎相见，也反过来证实了这种乌克兰研究的前瞻性。

（责任编辑 张昊琦）